

全球通胀压力正在升高

张莱楠

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去年发展中国家通胀、发达国家通缩的格局再恰当不过。不过,眼下,在全球流动性泛滥、席卷全球的极端天气以及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的动荡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全球所有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通胀正有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蔓延的趋势,全球整体性通胀的特征愈发明显。

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让局部波动和风险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系,物价也不例外,这种价格联动使得第二轮全球通胀效应“越发明显”。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1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为231,比上月上升3.4个百分点,已连续7个月上升,为粮农组织1990年开始统计全球食品价格以来的最高。全球谷物与软商品期货价格再创新高,其中棉花更是创美国南北战争150多年以来的高位。1月份,作为大宗商品龙头

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月度环比上涨8.54%,同比上涨22.9%;贵金属方面,通胀忧虑加速国际黄金和白银价格上行,国际金价再次突破1400美元,中国面临的输入性通胀压力达到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高点。

去年以来,率先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的多个新兴经济体经济过热、通胀“高烧”不退,尽管以货币紧缩方式对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高点。去年以来,率先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的多个新兴经济体经济过热、通胀“高烧”不退,尽管以货币紧缩方式对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高点。

1月份,欧元区通胀率同比上升2.4%,高于2010年12月份的2.2%,增幅创下27个月新高,其中德国通货膨胀率升至2%,为2008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而英国通胀形势更是加速抬头,英国1月通胀率跳涨至4%,比央行目标水平高出一倍,贸易加权指数本周早些时候一度升至5个月高位;美国虽不及欧洲通胀压力大,

但CPI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1.6%,也为7个月以来的新高,就连长期受通缩困扰的日本,通胀也有抬头的迹象。1月日本国内企业物价指数为103.9,同比上涨1.6个百分点。这不仅是日本企业物价指数连续第4个月同比上涨,也是自2008年11月以来首次出现较高涨幅。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是全球金融市场和通胀预期的风向标。近期,美国债收益率一路飙升,10年期一度涨至3.7%;而TIPS利差也迅速上涨,创造了去年四月份以来的高点,这说明发达国家的通胀形势已经引起了市场的担忧。

事实上,由于原材料涨价效应沿供应链传导需要时间,真正的价格压力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全面显现,届时将进一步推高全球通胀水平。在这一形势面前,提前启动加息进程是大概率事件。就美国而言,会在赤字、就业与通胀压力之间寻求平衡点,这也决定了“政策退出”和巩固经济复苏之间的艰难平衡会让美国加息决定比较谨慎,但目前市场长期实际利率的升高会对美联储长期利率形成倒逼机制,美

联储货币政策调整的时间窗口很可能比我们预想的来得更早一些。而欧洲方面,欧洲央行官员表示:我们已准备在需要时果断、迅速采取行动。我们的目标相当明确。为了避免非固定型通胀预期,我们必须在需要时改变货币政策立场。这透露出为应对通胀趋势加息的政策信号。

此外,一些资源型国家如澳大利亚、挪威、新西兰等已率先“退出”经济刺激计划,并且短期内有随时加息的可能。经济复苏比欧美迅速、且存在资产泡沫和通胀风险的国家如印度、韩国、巴西等很可能早于美国加息,全球正在为预防通胀恶魔而厉兵秣马。

通胀压力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升高,将在金融危机之后再让我们亲身体会到什么“经济全球化,风险全球化”,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风险,才能更有效地作出应对。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

防止经济大波动 关键在科学管理通胀

翟玉杰

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1日召开会议,讨论“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稿。会议强调,2011年是“十二五”时期开局之年。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提高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

与201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1年经济工作的要求相比,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稳增长、调结构、防通胀”的基础之上,首次提出了“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这一细微的变化,既是对我国经济过去“一放就热、一热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又放”教训的总结,也是中央政治局对当前经济形势的预警,将对降低、甚至基本消除经济结构调整和通胀预期管理等调控政策可能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消极影响发挥积极作用。

当前有可能导致我国经济出现较大波动的最主要因素,依然是物价。2月2日,温家宝总理在山东省曲阜市考察时指出:“今年我们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是稳定物价。”应当看到,根据中央“增加供给、加快流通、稳定市场”的要求,经过央行和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目前我国稳定物价总体水平的最困难时期虽然已经过去,CPI也由2010年11月份的5.1%下降到今年1月份的4.9%,但是通胀压力依然十分巨大。

国内方面,能源价格上涨冲击依然不减,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涨大势已定,夏粮主产区旱情依然形势严峻。国际方面,发达国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推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和通胀预期上涨,人民币升值和热钱流入压力继续加大。所有这些因素,不仅可能进一步推高通胀预期、给CPI带来巨大压力,而且也可能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世界各国管理通胀预期的实践告诉我们,管理通胀预期对宏观经济来说是一把“双刃剑”,适度管理有利于宏观经济的发展,过度管理却会导致宏观经济出现较大波动,甚至使宏观经济“元气大伤”。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国央行要分多次调整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而不是“一步到位”;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行的经济“休克疗法”真的差点让俄罗斯经济“休克”。具体到管理通胀预期所采取措施的效果也存在双面性,例如加息,一方面,为应对物价过快上涨,亟须上调利率使银行存款利率转“负”为正;另一方面,持续加息又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国际热钱涌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成本上升、楼市风险加大等不利因素。

能否有效降低风险是管理通胀预期成败的关键。为此笔者认为,在现有行政和金融手段的基础上,政府在管理通胀预期的过程中应当在方便中小企业融资、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费等方面加大力度,这既是将经济出现大波动风险降至最低的需要,也是公众热切的期盼。



政策扶持已多年,国企轻松赚大钱。产权名归全民手,肥水难众人田。惠及员工最慷慨,上缴红利却可怜。名至实归才公正,国企理应多贡献。

赵乃育/画 孙勇/诗

旱灾凸显农业发展思路亟待转变

陆志明

2011年初北方冬麦旱情再度将中国粮食安全话题推到了前台。近期媒体的相关报道表明,这一问题可能日趋严峻。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认为新兴经济体正面临通胀考验,粮食问题突然变得严峻起来;俄罗斯粮食联盟组织表示,俄因遭遇旱灾,2011年2-3月将会出现“粮食赤字”;IMF最近出炉的报告也指出,中国北方冬麦旱情可能会提高对国际粮食市场的需求,从而进一步推高国际市场的粮价。

虽然目前黄淮、华北地区的受灾面积还未达2009年1.41亿亩的高点,但实际上今年的旱情却可能比以往更为严重。2009年2月中下旬之后连续出现明显降水,大幅缓解了之前的冬季旱情,而今年2月份降水量仍很有限。且进入3月份之后,冬麦开始返青返绿,对水量需求会有大的提升,此前若不做好抗旱灌溉工作,将直接影响到黄淮、华北这一冬麦唯一主产区的夏粮收成。一旦夏粮歉收,

那么粮价、物价很可能会出现滚动上升的连锁反应。

正如温总理所言,“保粮价”就是“保物价”,粮食安全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此次北方冬麦旱情充分反映出我国目前的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思路亟需改进。

首先,粮食主产区的地域分布状况有待调整。由于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推进,许多传统农业生产大省已经开始从粮食“净流出”转为“净流入”。如传统“鱼米之乡”的江浙沪、“天府之国”川渝等,目前已经大规模向工业中心过渡。

原本最为优质的粮食主产区可耕种土地面积逐渐减小,而中西部大开发、东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又开始蚕食次优的中西部粮食主产区。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中西部地方政府日趋依赖土地财政,而土地财政将会不断侵蚀城郊优质的农业用地。从而使原本捉襟见肘的可耕地面积进一步收窄。目前东南部优质的耕地资源消失,中国农业还可以转向中部,虽然气候和灌溉成本可能有所提高,

但仍可延续。而一旦中部也开始进入工业化阶段,西部可供开发的耕地资源极为有限,那么中国的粮食安全将会受到较大的冲击。

其次,造成目前农业发展后续乏力的主要原因还是市场化程度较低,农业发展积极性不高。我国政府长期以来虽然强调农业是立国之本,三农问题是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在实际问题处理中却仍然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以农养工”思路。限制农产品价格,客观上起到了提高工业品相对价格的效果,推动了工业经济的超常规发展。

这种发展模式带来的最直接结果就是——农业经济始终难以得到正规市场化的发展机遇,政府保护收购价实际上演变为政府“限制收购价”。按照政府目前公布的2011年小麦收购价格,价格最高的白小麦也仅95元每百斤,比2010年上涨区区5元。折合为大宗商品交易单位,亦不过1900元/吨。与2月11日郑商所强麦主力合约1109达到的历史新高2999元/吨相比,实在有点过于廉价。

这也难怪时常可以听到媒体报道粮食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农民收入增长有限甚至个别地区还出现亏损的新闻。虽然政府与大型企业在上游生产领域实现价格限制,但其真实价格水平还是在下游流通领域得到体现。这也是为何即使政府保住了上游价格,却始终无法抑制食品价格、甚至通胀在下游扩张的根本原因。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加大农业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力度,放开农产品价格限制。只有当市场给出合理的价格信号时,社会资源(包括外出务工的劳动力)才会大规模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从而推动农业现代化与产业化。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用地规模不断缩减,农民收入始终无法得到有效提高的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国工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如果工农业不能协调发展,资源依然向工业不断倾斜,一方面投入产出效率会递减,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农业部门效率持续低下,拖累整个经济平衡发展。目前的农产品供给深受灾害天气影响,并导致价格快速上升,推高通胀压力就是典型的例证。

(作者系交通银行金研中心研究员)

直言不讳 | Call a Spade a Spade |

规避铁路债务危机 应切实引进民间资本

吴睿鹤

2010年国家审计署国外贷拨款项目审计服务中心出具的关于铁道部2009会计年度的审计报告显示,2009年末,铁道部负债总额已达到13033亿元。从2006年至今,铁道部发行铁路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以及铁路建设债券共计5627亿元,目前已兑付的还不到1000亿元。

尽管铁道部官员曾向社会公开声明,中国铁路整体债务水平上看,处于安全、合理、可控水平,高铁发展不会导致债务危机,但是从现实来讲,形势不容乐观。

民生银行发布的《2010年中国交通运输业发展报告》显示,快速增长的债务融资规模使得铁道部门在2009年支付的利息已达到400亿元以上,未来可能超过1000亿元。不仅如此,根据调整后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到2020年,全国铁路运营里程将达到12万公里以上,其中新建高速铁路1.6万公里。这1.6万公里高铁的建设资金,将有一半以上来自债务融资,从2014年开始,铁道部将迎来还债高峰。

虽然现在铁路建设资金的融资渠道很多,如银行贷款、债券融资、铁路建设基金、保险融资等,但随着铁路建设规模的急剧膨胀以及铁道部负债率的陡然增大,融资已成为目前颇为棘手的难题。

为进一步加快铁路建设效率和拓宽融资渠道,铁道部曾于2005年7月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资本参与铁路建设经营的实施意见》,紧接着2006年6月铁道部又推出《“十一五”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推进方案》。虽然这些政策颁布实施已有四五年时间,但投资多元化的市场融资模式没有任何形成的迹象,尤其是民营企业资

本仍不敢向铁道部伸出“橄榄枝”。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民间资本没有话语权。对于铁路投资而言,铁道部的资本动辄数千亿元,民间投资顶多数十亿,所占份额太少,进去以后参与决策权的机会几乎没有。如果非要投资,就必须“组团”,形成一股合力,但这对于财大气粗的“铁老大”来说,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小孩子,要想拥有话语权,简直比登天还难!

另一方面,回报难以兑现。按常理讲,有投资就应该有回报。可是,现行的铁路财务核算模式,主要考量全行业盈亏,而非企业盈亏。具体程序是,各铁路局将收入统一交到铁道部,铁道部根据运营情况按一定系数返还。这意味着,每个铁路局的收入,并非真正的收入所得,每个局也称不上什么企业。可以想见的是,投资者连自己管辖区的收入、成本和利润都无法控制,民间资本的投资回报同样也不可能得到有效保障。

更为重要的是现行铁路行业的政企不分。各铁路局和铁路分局作为铁路运输企业,虽然名称上分别是一二级法人,但并不真正拥有法人财产权,也没有自主决策、独立经营和财务核算的权力,所以,它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营主体。而铁道部不仅掌控着经营决策,掌握着财务清算制度的命运,而且负责行业运行规则的制定和监督,这种高度合一的体制,必将导致政府与企业间的权责边界不清,效率低下。如此以来,民间投资者难免对铁道部的双重身份,心存疑虑。

因此,要想规避铁路债务危机,目前首要的任务是激活民间资本投资铁路建设的热情,铁道部政企分开,惟有体制改革,让民间资本在铁路投资中拥有话语权,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铁路债务危机。

铁矿石谈判 争话语权首先要自身硬

王旭东

主导了中国钢铁行业数年来进口铁矿石谈判的中钢协主要领导人罗冰生和单尚华21日宣布退休,随着铁矿石年度谈判的终结,曾经参与、影响着中国铁矿石谈判的“元老”的退休,被业内视为“铁矿石谈判旧时代的结束”。

旧时代的结束,通常意味着新时代的到来。但是,在铁矿石谈判上未必能那么容易迎来新时代。在铁矿石谈判“旧时代”,由于中国方面缺少话语权,在进口铁矿石时总是硬不起来,“中国模式”、“中国价格”在一次次谈判中化为乌有。

在铁矿石谈判上,套用中国一句俗语“打铁需要自身硬”,留有严重计划经济色彩的国内铁矿石价格双轨制改革问题,还有各大钢企之间、大钢企与中小钢企之间相互拆台问题、铁矿石里的“含腐量”问题等使得中国钢铁行业在谈判中硬不起来。

随着元老的退休,谈判者必将换将。但是,在基本谈判格局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人的因素不是决定性因素,我们不能忘记一个最基本的市场规律——供求关系决定市场价格。话语权靠谈判,更靠市场。国土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2009年发现50亿吨铁矿,同时中国还有很大的铁矿找矿潜力,即使中国3年甚

至更长时间不进口,铁矿资源也有保障。中钢协会长邓崎琳也表示,到2015年,我国自产铁矿的供给能力将由现在占总需求量的不足40%,提高到45%左右;进口铁矿中的权益矿比例也将有较大提升,预计将由现在的不到15%,提高到50%以上。

当然,我们不能坐等铁矿石“自给自足”时,才自然生成话语权,这等于放弃争取话语权。其实,钾肥谈判的成功经验就可以借鉴。在我国钾肥对外依存度67%、此前的多次谈判败北的情况下,去年初,中国谈判小组与BPC(白俄罗斯钾肥公司)签订了2010年度钾肥海运销售合同。该合同量为100万吨(20%上下浮动),到岸价为350美元/吨。这一价格较当时国内现货价低17%,打破了国际巨头价格垄断的梦想。在大宗资源类商品的进口上,如何争取话语权,功夫在谈判桌上,更在谈判之外。

中国铁矿的新发现与新采掘、进口铁矿的权益矿增加,为“自身硬”创造了好的条件,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要想增强在谈判中的主动性和话语权,还要解决好自身存在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面对国际巨头的价格垄断,我们不能全部寄希望于“自给自足”来解决问题。争取国际话语权,是中国企业,尤其是诸多国企的共同责任和努力方向,无论有多么艰难,都不能放弃。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声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邮箱至pp118@126.com。